

《圣经》文学与文化

纪念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论集

卢龙光 王立新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文学与文化：纪念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论集 /
卢龙光，王立新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5
ISBN 978-7-310-02687-6

I. 圣… II. ①卢…②王… III. ①朱维之一纪念文集
②基督教—研究—文集③圣经—宗教文学—文学研究—
文集 IV. B978-53 I106.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019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省迁安万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30 印张 1 插页 468 千字

定价：62.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前 言

2005年是我国已故著名《圣经》研究和基督教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顾问,南开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朱维之先生从教六十余年,桃李满园,著作等身,不仅为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还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缅怀朱维之先生的学术功绩,繁荣和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圣经》文学与文化、基督教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7月3日至5日在南开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社科院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七十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共同缅怀了我国一代大师级学者朱维之教授,并就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相关问题展开学术讨论。本次会议主要围绕着对朱维之教授学术贡献、基督教神学与文化、《圣经》文本研究和基督教与文学批评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朱维之教授以自己的毕生精力致力于《圣经》、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他的一系列著作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丰富而宝贵的遗产。他是一位真正“由诗而入神”的思想者,是我国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朱先生强调的希腊—希伯来两希传统,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他在宗教与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的深刻见解,为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树立了范例;他翻译的基督教文学名著,成为至今仍无人能超越的范本;在他主编的影响广泛的教材中,他对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关系的思考,使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走上了更为科学的道路。

在《圣经》与基督教文化研究这个议题上,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发

表示了精辟的见解。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和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分别就《圣经》阐释的限度问题展开了论述。刘意青教授认为,以文学研究和阐释的方式介入《圣经》文本总体上值得肯定和欢迎,但是其自由度的把握是防止歪曲和滥读之关键。王立新教授则结合对《约伯记》的阐释指出,如果游离了文本的道德承载,游离了宗教文本本身对于信仰和价值追求的宗旨,关于《圣经》文本的任何阐释都只能是表面的和游戏性的,有效的《圣经》阐释必须考虑到宗教自身的内涵和神学思想是如何被建构与表现出来的。河南大学梁工教授以《旧约》、古代后期犹太文献和《新约》研究为基础,指出基督教的弥赛亚观念经历了现实领袖式弥赛亚、理想君王式弥赛亚、末世救主式弥赛亚、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式弥赛亚,以及耶稣和保罗的弥赛亚观念等几个阶段。上海师范大学孙景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卢龙光教授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卢龙光教授考察了《罗马书》14:1-15:13显示的身份危机,指出保罗能够把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身份问题的重要性按救赎性和文化性、必须性和处境性来区别对待,而直到20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却都没有从中国基督徒的角度来考虑祭祖问题,一味认为祭祖等同于偶像崇拜。香港中文大学谢品然博士和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则从《圣经》与公共性和政治的角度展开了论述。谢品然博士通过对《妥拉》的阅读,指出上帝完成创造工作后在对人的祝福中所展现出的“妥拉”(律法书)精神,也是在创造中为全人类所立的生存蒙福游戏规则,有关《圣经》中“国”、“名”和“立国基础”的人类公共性,为建构公共的《圣经》神学提供了基础。陈志强教授通过对《约翰启示录》中种种意象的分析指出,《约翰启示录》是一篇下层民众反抗压迫的战斗檄文,其政治倾向是基督教建立之初罗马行省社会真实生活的思想反映,是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另外,南开大学陆扬教授考证了《圣经》中的乐器问题,武汉大学张思齐教授论述了保罗的精神操练,华东理工大学居阅时教授探究了《圣经》中的植物象征义,香港浸信会神学院黄福光博士考察了开封犹太人的逾越节《哈加达》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焯昌博士从翻译学的角度考察了上帝的中译名问题等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学者亦有精彩发言和回应。

在基督教文化与俄国文学研究方面,南开大学王志耕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苏联时期的革命文学在俄罗斯文化的强大制约下,形成了相对于《圣经》的“直接引语”(巴赫金语),其隐语形态渗透于艺术表现的三

个方面,即原型形象引语、叙事结构引语和叙事类型引语。河南大学赵宁教授考察了托尔斯泰晚年编写的《福音书》,认为它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的理性宗教观,与托尔斯泰的生命哲学、道德哲学遥相呼应,相互渗透,构成了托氏宗教哲学的重要根基。首都师范大学的林精华教授则探讨了俄国东正教正面价值在中国失落的原因。在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关系方面,四川师范大学唐小林教授认为,构成现代汉语诗学基础的元叙事、世俗性、超越性和反思性等诗学观念之产生与基督教密切相关,基督教参与了现代汉语诗学的价值奠基与价值重构,进入了现代汉语诗学的价值核心。西南师范大学王本朝教授认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在表达基督教的神性价值,创造中国文学的神性纬度之时,也在不断遮蔽社会现实,陷入个人价值的乌托邦设计中,从而出现了绝对价值的丰富和个体价值的虚无现象。上海大学许正林教授认为,抗日战争引发的危机导致了现代作家宗教意识的回归,包括从宗教角度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借宗教叙事来生发文学的社会功能,民族危难中辨识宗教人格等。温州师范学院李新德副教授则探讨了晚清新教传教士对汉语佛教经典的英译问题。在基督教和欧美文学与文化关系方面,烟台大学马小朝教授认为,希腊神话与《圣经》有共同的文化出发点和历史内涵,二者皆以象征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历史上调整和变革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使其由自然关系过渡到文明的社会关系的重要阶段。德州师范学院张丽副教授从基督教文化语境出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是个喜剧人物,他在中国长期以来之所以被作为悲剧人物看待,乃是中国语境下的误读。与会的其他学者亦有精彩发言和讨论。

本次会议上,与会学者不仅共同缅怀了朱维之先生,交流了学术思想与学术见解,并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而且沟通了感情,增进了友谊,实为一次成果丰富的学术盛会。

在会议结束后的一年时间里,各位学者经过认真的修改,陆续将部分论文寄到编者手中。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理和编辑,终于编成了此书。我们想,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是纪念朱维之教授的最好方式。

这次学术会议的召开和本书的出版都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大力资助下得以实现的,特此鸣谢!

主 编

2006年9月

3

目 录

前言	1
大师风采	1
朱维之教授治学思想和学术成就 / 崔宝衡	3
敬仰与思念	
——朱老百年诞辰纪念 / 黄晋凯	6
纵横自有凌云笔	
——朱维之比较文学思想论略 / 孟昭毅	8
“由诗而入神”的思想者	
——纪念朱维之先生 / 杨慧林	18
朱维之先生著作目录及概述	24
宗教文化及神学研究	27
关于基督教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 刘建军	29
诗学、时间与上帝 / 刘光耀	39
食物或割礼：再探保罗和彼得之间的冲突 / 谢品彰	48
《罗马书》14:1-15:13 显示的身份危机	
——对中国基督徒祭祖争议的引申意义 / 卢龙光	60
马丁·路德与《圣经》解释学 / 张仕颖	69
现代中国如何认识俄国东正教 / 林精华	79
“亚洲的福音书”	
——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 / 李新德	97
古代以色列宗教对异教文化的吸收与摒弃 / 孟艳玲	112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感悟伊甸园 / 王 力	119
	1

《圣经》文本研究	129
上帝的中国名字	
——《圣经》中上帝称谓的中文翻译 / 李炽昌	131
创造、巴别塔、亚伯兰的呼召	
——解读“妥拉”(律法书)精神中的公共性 / 谢品然	145
中国开封犹太人的逾越节《哈加达》(Haggadah) / 黄福光	162
《圣经》的阐释与文化批评 / 刘意青	169
《圣经》的悲剧美 / 王 蓓	185
解经的重要途径	
——植物象征义对《圣经》中的解释 / 居阅时 刘 阳	195
希伯来《圣经》中的诗歌 / 林培泉	206
《圣经》中的原始小说初探 / 杨正和 胡 希	223
《旧约》中的琴箫瑟笛 / 陆 扬	228
事件·文本·意义	
——《圣经》文学中的所罗门诸形象浅析 / 黎新农	236
文本的结构与《圣经》的文学阐释	
——以《约伯记》为例 / 王立新 王 丽	244
《约伯记》的戏剧叙事浅说 / 郝 岚	253
《诗篇》第 110 篇解析	
——祭司,君王 / 潘朝伟	262
论《圣经》文献中的弥赛亚观念 / 梁 工	270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保罗的精神操练 / 张思齐	285
《圣经·约翰启示录》的政治倾向 / 陈志强 于 可	298
基督教与文学批评	307
现代汉语诗学的现代性建构与基督教 / 唐小林	309
希腊神话和《圣经》的共同文化出发点和历史观内涵 / 马小朝	325
俄国的象征主义:革命与宗教 / 王志耕	334
托尔斯泰的《福音书》 / 赵 宁	345
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渊源 / 梁 坤	362
《神曲》对《圣经》的文学诠释 / 朱耀良	373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鲁滨逊形象 / 李晓卫	383

麦克白与拉斯柯尼科夫形象共性探析 / 张 丽	393
美与圣的紧张:王尔德《莎乐美》的神学解读 / 李小驹	400
宾威廉的《天路历程》官话翻译 / 李艳霞	409
J. M. 库切的“摩西”	
——J. M. 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解读 / 王旭峰	425
无根的求证	
——对卡夫卡长篇小说主题的神学解读 / 唐梅花	433
中国现代作家抗战期间的宗教意识探析 / 许正林	447
《喧哗与骚动》中的双重意象及《圣经》隐喻 / 董丽娟	456
附录:《圣经》各卷名称对照表	465

大师风采

朱维之教授治学思想和学术成就

南开大学 崔宝衡

朱维之先生(1905—1999)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从教六十余年,桃李满园,著作等身,在我国教育界、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

朱先生出生于浙江温州农村,中学毕业后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深造。大革命时代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北伐。1930年赴日本中央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习、进修,回国后在福建协和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任教,曾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教授,先后担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系主任等职,并当选为天津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天津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顾问。

朱先生早年以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跃登文坛,1927年开始在上海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戏剧作品及文学评论,1935年出版《李卓吾论》,1939年出版《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史略》是一部以文艺思潮为中心线索的文学史,他破除了以朝代或世纪为纲要的旧体例,系统地梳理与描述了三千多年来中国文坛变迁、思潮更迭、作家辈出的历史进程,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史略》曾多次再版,新中国成立后在港台地区曾多次重印,1991年上海书店将该书编入《民国丛书》影印发行。1988年朱先生对《史略》进行了修订、扩充,更名为《中国文艺思潮史稿》,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朱先生精通英、日、俄等多国语言。1928年即翻译出版爱尔兰著名作家叶芝的诗剧《心所向往的国土》,此后,多有译作问世。1957年翻译出版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的长诗《复乐园》,1981年翻译出版《斗士参孙》,1984年翻译出版《失乐园》,1993年翻译出版《弥尔顿抒情诗选》。朱先生数十年呕心沥血,翻译、研究弥尔顿的诗歌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国内无人能够匹敌。其中煌煌译著《失乐园》凡十二卷,一万多行,是国内最早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全译本。

朱先生是国内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

在1941年出版的《基督教与文学》一书中,朱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原始时代以来,艺术和宗教一向不可分离,我们若研究文学艺术,不能不涉及宗教,研究宗教也必须到文学艺术里去探求。宗教本身便是艺术,基督教是最美、最艺术的宗教,《圣经》是最优美、灿烂的文学杰作。《基督教与文学》全面论述了《圣经》的文学特质及其对欧美文学的深远影响,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宗教界的广泛关注,多次再版,1991年同样被上海书店列为《民国丛书》影印发行。1951年朱先生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文艺宗教论集》出版,此书广征博引,纵横捭阖,论述了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对中外文学及著名作家创作的影响。上述两部著作在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在一段时间内把宗教研究列为禁区,朱先生也被迫中断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被冠以“反动宗教鼓吹手”的罪名,遭受迫害。然而,朱先生的学术信念坚定不移。20世纪70年代末,冰雪消融,春江水暖,朱先生敏锐地觉察到政治气候与学术气候的变化,率先在《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2期上发表了《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一文,强烈表达了探索研究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的学术勇气与学术期望。此后,朱先生带领南开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陆续编写、出版了《〈圣经〉文学故事选》(1983)、《希伯来文化》(1988)、《〈圣经〉文学十二讲》(1989)、《〈圣经〉奇文妙语选》(1992)、《古犹太文化史》(1997)、《古希伯来文学史》(2001)等系列著作,使南开大学中文系迅速成为国内研究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文化的一方重镇。这些著作不仅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对《圣经》进行了新的解读与阐释,同时厘正了希伯来文学、希伯来文化的发展历史,论述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深远影响。朱先生多次强调,近代西方文化有两大源头或两大传统,其一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其二是希伯来—基督教的中世纪文化传统,两者哺育滋养了光辉灿烂的西方文学与文化。我国学术界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言必称希腊罗马,绝口不提希伯来,这是无知与偏见,应当予以纠正。朱先生的真知灼见,至今仍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工作的学者,朱先生十分重视教材建设。他认为,编写教材一要有科学性,二要有实用性。所谓科学性,就是要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作实事

求是的评价,既要重视西方文学,也要关注东方文学,两者不可偏废,东西方文学的碰撞、交流、融合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所谓实用性,就是内容、体例要适合教师与学生使用,把最精粹的知识教给学生。多年来,朱先生先后主编了《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外国文学史·亚非卷》、《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中外比较文学》等多部优秀教材,受到高校师生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敬仰与思念

——朱老百年诞辰纪念

中国人民大学 黄晋凯

2005年7月,应立新君之邀,赴天津南开参加纪念朱老(维之)百年诞辰暨学术讨论的盛会。原本以朱老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我们一直相信他活到百岁这一天是不成问题的。但不料六年(1999)前的9月,却突然收到了先生仙逝的噩耗,我们立即赶往津门,向朱老奉上我们的敬意和哀思。当我坐在纪念会的会场上时,我还在想,如若先生健在,那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次聚会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先生的忌日是9月1日。我之所以留下这个印象,是因为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联想:先生是否特地“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驾鹤西行的呢。9月1日这个开学日,对于所有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一个美好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日子。而从教大半生的朱老,偏偏选择这一天为他的生命画上最后的句号,难道不意味着他对教师生涯的深情厚意和无限留恋吗?

我有幸结识朱老、并在他率领下工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是云开日出、阴霾尚未散尽的日子,应北方几所院校老师之邀,朱维之先生和赵澧先生出面主持编写一本外国文学史。这是“文革”以后的第一部教材,我不记得当时是谁的动议,将此书定名为《外国文学简编》,它多少反映了编者当时不愿过分张扬的复杂心理。不料这个书名一用就用了二十多年,一个很不响亮的书名,现在竟被视之为“品牌”。教材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是最令编写者们感到快慰的事。

初见朱老,我心中便留下了一位大智者的印象:圆润饱满的天庭,慈眉善目的面容,轻声慢语的谈吐——作为这个编写群体最小的小字辈,我对先生始终抱着高山仰止的崇敬心态,起初甚至可以说是自卑地敬而远之。但朱老对我辈后生,却是始终如一的平等谦和,从无半点居高临下的霸气,因而编写组内总是弥漫着民主的气氛,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发表。记得我第一次在编写组的会上忐忑不安地汇报我的写作构想时,当即就得到了朱老的热情肯定,这让我紧张的神经一下子

就松弛了下来。此后，他也总是鼓励多于批评，使大家都能放开手脚投入编写工作。

朱老学贯中西，著译等身。在和他熟悉了以后，我经常可以荣幸地得到他的馈赠，但使我不安的是，他总在扉页上用娟秀的字体工工整整地写上“晋凯同志指正”、“晋凯兄存正”等字样。对这些“折杀我也”的题字，我每次都要提出“抗议”。但先生总是笑而不答，“一意孤行”地照写不误，令我很是无奈。我想，他是已经习惯了，习惯于尊重他人，习惯于平等对待所有的人，哪怕是我这样的晚辈。

先生甘于寂寞，不为潮流所动，独步于学海而为后人垫石铺路。他对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学的研究，对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在我国学界都是开拓性的。在20世纪40年代写出《基督教与文学》一书时，在50年代初出版《文艺宗教论集》时，朱老基本上是个独行者。经过“文革”的历练后，他“好了伤疤忘了疼”，不仅初衷不改，自己依然坚持对基督教与文学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还扩而大之，率领众弟子投入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朱老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行者之一。他早年专攻中国文学时，就借鉴西方的方法，写出了《中国文艺思潮史略》，独树一帜地阐释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他关于希伯来文化是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论断，已成学界的共识；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是我国高校较早的一部教材。今天，基督教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都已成为显学，从业者甚众，形势与先生拓荒时已大不相同。朱老的开创之功，已载入20世纪的学术史册，他那不趋时尚、默默耕耘的精神，在当下浮躁之风盛行学界之际，更显弥足珍贵。

朱先生学术视野开阔，见解独到。即使年事已高，他的学术思想也从不保守，其超前意识还常使我们后辈有跟不上的感觉。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传入国内，引起很大争议，嗤之以鼻者大有人在。朱老却不仅充分肯定这一派文学的创新成就，而且敏锐而深刻地指出，现代主义文学与“二希文化”同样有着渊源关系。我们当时不甚理解。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这种联系真可谓“千丝万缕”，从观念到方法，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确都可以找到许多相通之处。

自认识朱老以来，我一直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看作是朱老的学生，但始终不知道他是否认可。先生百年之后，我当不断以此自勉，努力争取做一名合格生。

纵横自有凌云笔

——朱维之比较文学思想论略

天津师范大学 孟昭毅

朱维之(1905—1999),浙江平阳人,当代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家、翻译家,一生从教六十余年,著述三十余种近千万言,著作等身。他学贯中外,博古通今,桃李满天下;东西兼通,见微知著,纵浪大化中。以朱维之先生的道德文章,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朱先生被选为首届天津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朱维之先生的比较文学思想和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比较文学思想的形成

早在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十四岁的朱维之进入温州的浙江第十师范学校(现温州一中)读书时,他不仅接触到了新文化运动,醉心于新文学,而且对外国文学格外钟情。印度泰戈尔来华的讲演,报刊上介绍的泰戈尔的作品,同学中流传的苏曼殊的《文学姻缘》,“官话和合本”的《圣经》新译本,都引起他的好奇心,对其中的《诗篇》、《雅歌》、《约伯记》、《马太福音》等备觉美不胜收,开始感受中外文学经典的文本美。尤其是读苏曼殊的《文学姻缘》,觉得很有吸引力,在古色古香的译诗中开始体会那些带有异国情调的新的诗思、新的意境和新的韵味。苏曼殊译的“春华瑰丽,亦扬其芬;秋实盈衍,亦蕴其珍。悠悠天隅,恢恢地轮,彼美一人,沙恭达纶”诗句,不仅使他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而且开始让他对深宏的印度文学心向神往。这对以后成就他的中外文学梦,不能说“不是一次绝好的文学美味佳肴”。

1924年,因家境清贫,他进入免费的金陵神学院学习,开始对《旧约》中那些美丽的篇章有了新的理解。在此,他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文学,一部笼罩着宗教神秘外衣的《圣经》,被他当作绝妙的文学美文来阅读和研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成为他关注的对象。这不仅确立了他毕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并使之开始与比较文学结下不解

之缘。1927年冬到1929年春，他在上海青年协会书局的书报部当编译员时，不仅译过诗，编过剧，写过小说，更重要的是写过《戏剧起源与宗教》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等论文，前者较早地表现出他比较文学的学术思维，为今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后者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即成为他进入高校讲坛的晋身之阶。

1929年，朱维之二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华，他离开洋房栉比、人声鼎沸的上海，来到坐落于闽江之滨、鼓山之麓的环境幽静、山清水秀的福建协和大学（现福建师范大学）。他应该校国文系主任王治心先生的推荐邀请、校长林景润博士的首肯，开设一门中国新文学的课，内容是他1927年在上海《青年进步》杂志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上发表过的长篇论文《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这对他有梳理“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与此同时，他还能以学生身份听课学习，一举两得。他主要是随班听日语、法语、英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等课程。该地风景宜人，山有茂林修竹，江有潮汐风帆，松韵和涛声应和，不仅陶冶了他的性情，而且也培育了他的学术修养，为他日后从事中外文学史研究铺平了道路。

1930年秋到1932年秋，他负笈东瀛，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专修科进修学习。他在早稻田大学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山口刚教授的启发下从事中国历代文艺思潮变迁的研究，其成果《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39年由长风书店出版，1946年又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国内最早问世的一部言简意赅的比较完整的文艺思潮史，它打破了以朝代更替作为主要线索的文学史格局，代之以文艺思潮的演变为主要线索，描述文学史的发展变迁。书中着重记述了儒、道、佛思想对中国文艺思潮的变化与文学创作的影响，能明显发现受西方文学史与文艺思潮史研究影响的痕迹。此书从内容到结构都使人感到耳目一新，颇受欢迎。在半个世纪之后，该书在框架大体不变，只增添一章“文体大革命”和“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一段思潮史的情况下，以《中国文艺思潮史》之名，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重新出版。这部书实际是运用西方文艺批评的方法，重新审读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尝试，为他日后形成比较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有极大的帮助。

1932年秋，他回国后继续在协和大学任教，同时担任不定期刊物《福建文化》的主编。这段时间是他的学术积累时期。1936年夏，他开始到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抗战期间，他固守孤岛，避居租界，一边教